

蓝鼎元筹台的说服艺术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郭志超

畚族政治家蓝鼎元，原为福建漳浦莒谿一介寒士，康熙六十年（1721 年）四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南澳总兵蓝廷珍奉檄率师平台，时年 41 岁的蓝鼎元作为其族兄蓝廷珍的幕僚从征。在平台期间及此后，蓝鼎元所写的公檄、条陈、上疏、书简和著述多有筹台谋略，对台湾民众，特别是对起义军产生攻心之效，更对当时和此后清廷和地方当局的政策发生了重要影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多纳其议，甚或援引影响廷议；雍正帝御览蓝氏上疏，颇有称道；乾隆帝对蓝氏筹台之策褒评有加，令闽浙总督李侍尧等人购读、参酌蓝鼎元所著《东征集》；晚清台湾巡抚刘铭传精读蓝鼎元著述，汲益以为施政参考。蓝鼎元理台论说的奏效，既是其思想的厚积薄发，也与其出色的说服艺术密切相关。说服即用语言影响对方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本文例说蓝鼎元筹台的说服艺术。¹

一、单刀直入的“摘心”法

康熙六十年（1721 年）朱一贵起义，声势浩大。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急忙移驻厦门，署蓝廷珍为征台总指挥，与水师提督施世标先后移师会合澎湖，待机进剿。若能单刀直入，影响或改变受说之众的观念，是疏导其行为最迅速有效的途径。此即为“摘其心者”。此法得计，可分化离析其阵营，达成兵少血刃。朱一贵自谓为朱明贵胄，立帜书“大元帅朱”，攻下府城后改称王，受呼万岁，年号永和。蓝鼎元所拟的《檄台湾民人》针对此，言：“朱一贵内地莠民，为乡闾所不齿，遁逃海外，钻充隶役，又以犯科责革，流落草地，饲鸭为生，至愚至贱之夫，谓可与图大事乎？附和倡乱之徒，皆椎猪、屠狗、盗牛、攘鸡等辈，以及堡长、甲头、管事、各衙门吏胥、班役，曾有正人豪杰才俊与于其间乎？由于乱臣贼子，皆膺显戮；虽强如莽、卓，狡如孙、卢，无不骈首就戮，沈渊消族！况此小盗、贱役，智能不及中人，辄敢公然造孽，欲作夜郎于海外，冀腰领之苟全，无是理也！”²檄文所言削弱了起义军和台湾民众对朱一贵所奉正朔的信赖，削弱了起义军和台湾民众对刚建立政权的信心。

二、恩威并施的“服心”法

诉诸恐惧又给予希望，是说服对方改弦易辙的有力制导。为使起义军和附和民众“怀德畏威”为“服心之上计”，蓝鼎元代蓝廷珍拟檄发布台民。檄文言：“本镇总统大兵，会同水师提督施克期剿灭”，“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躬亲驻厦，督师讨贼，移檄浙江、广东三省会剿，旦暮即至。水师提督施亲率大兵，见在澎湖，克日进发。本镇总统万军前驱清港，缚鸡豚于笼中，禽鼠雀于鼎镬，至则屠之，何难之有！”在令对方“畏威”之后，接着又好言劝慰“怀德”归顺，檄文道：“土贼朱一贵作乱，伤害官兵，窃据郡邑，汝等讹居肘下，坐受摧残，无罪无辜，化为丑类，深为怜悯”。“惟念汝等贤愚不一，或抗节草泽，志切同仇；或不得已畏死胁从，非出本愿。若使崑冈炎火，无分玉石，诚恐有乖朝廷好生之德，且非本镇靖乱救民之心。为此不追既往，咸与维新。凡汝士庶番黎，莫非天朝赤子，向风慕义，悔罪归诚，回生良策，刻不容缓。”³急则挺而拒敌，宽则各寻生路。时人评曰：“此檄为解散贼徒数十万，平台第一妙着也。”⁴

三、晓以大害的警示法

康熙六十年（1721 年）六月，清军在台湾登陆后的七日内即击溃起义军，收复府治，接着剿抚起义军余部。同年秋，清政府平台大定之后，面临理台政策

的选择和调整,突出的问题是守台和垦台。清廷素视台湾为“反叛”“剿穴”,廷议以澎湖为海疆重地,两次平台,皆先驻澎湖而后取台得手,遂拟将总兵由台移澎。尽管这与38年前台湾归清,清廷拟守澎弃台有所不同,但仍是当年弃台的幽灵再现,仍是一定程度的变相弃台。蓝鼎元点破实质,指出:“何异欲弃台湾乎!”⁵他为蓝廷珍拟《论台镇不可移澎书》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先顺其思路,而后加以引谕,点明:若台镇移澎则澎不能控台。书曰:“台之视澎,犹太仓外一粒耳,澎湖不过水面一撮沙堆,山不能长树木,土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资捍卫,形势不足为依据。一草一木,皆需台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待战自毙矣。”“澎湖至台,……若天时不清,台飓连绵,浹旬累月,莫能飞渡。台中百凡机宜,鞭长莫及”。⁶清廷“移台镇于澎”之议系基于台湾“患自内生”而疏于“患自外来”之考虑,因此蓝鼎元将这种内患的眼光引及外患的更宽视野,指出台湾在海疆防卫的实质地位,提出了外夷犯台进而据台犯大陆的告诫。他说:“台湾一去,则泉、漳先为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俱各寝食不宁,山左、辽阳皆有边患。”⁷书此的稍早些时日,蓝鼎元代拟的《与制军再论筑城书》就指出:“统计宇内全局,则台湾……万一为盗贼所有或荷兰、日本所据,则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卧,关系东南半壁治乱”。⁸

晓之大利害,则能促使见识长远,处局部而能识全局。经蓝鼎元辨析,清廷历半年之踌躇,最后由新任水师提督姚堂据此说而上奏,康熙帝允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将仍设澎湖,总兵官仍驻台湾,水陆两中营悉还旧制,道标、守备、弁兵裁归台湾镇管辖,安设南北二路适中要害之处。”⁹

四、满足动机的诱导法

自台湾归清,清廷纳施琅留台之议后,以限渡、限垦等禁令遏制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镇压朱一贵起义后,清政府试图缩紧和限定台湾汉民社区,以便防范、镇压,遂有局部焚屋驱民乃至大范围的迁民划界的决定。这将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巨大浩劫。蓝鼎元以透彻的说辩制止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政策的筹划和实施为的是满足政治动机,达到预期目的。若动机无误而筹划不当,则明指筹划之果悖于动机,便容易劝止原拟的筹划。蓝鼎元代拟《复制军台疆经理书》和《复制军迁民划界书》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书曰:“一旦驱逐搬移,不能遍给以资生之藉,则无屋可住,无田可耕,失业流离,必为盗贼”;徙民虚地,“则是弃为贼巢,使奸宄便于出没”;¹⁰“无资可藉、无地可容之忧,民遂肯餐风宿露,相率于无何有之乡、大荒广漠之野乎?……假如强项不依,哓哓有词,将听其不迁而中止乎?抑以兵威胁之乎?……既已三令五申费尽心力,复听其不迁而中止,则宪令不行,是教民刁悍而开抗官犯上之风,非所以为治也。若以兵蹙之使移,则民以为将杀己,抗拒亦死,不抗拒亦死,必制梃与官兵为敌。至于敢敌,遂不容不杀矣。无故而歼我良民,于心有所难安。歼不尽则祸不已,歼之尽则人又不服,既上乖朝廷好生之德,又下失全台数百万之人心”。¹¹觉罗满保拟焚屋驱民、迁民划界之策,为的是杜绝“盗贼”,而若实施,结果则适得其反,于是他收阅两封复书后,遂有省悟,撤销焚屋驱民、迁民划界的计划。

五、驳劣陈良的并济法

蓝鼎元不但认定不可迁民划界,而且还应广听开垦。书曰:“疆土既开,有日辟,无日蹙。……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三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千万不可遏抑。今乃欲令现成村社废为丘墟,厉禁不能。……曩者诸罗令周钟瑄有‘清查流民,以大甲溪为界’

之请，凤山令宋永清有‘议弃郎峤’之详。今北至淡水、鸡笼，南尽沙马矶头，皆欣然乐郊，争趋若鹜。虽欲限之，恶得而限之？”¹²清政府治台的心病是对“台民好为盗贼”的疑忌，陈请垦辟应使对方释然于此。故蓝氏又说：“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因此，“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¹³既驳劣策又陈以良策，后者可将对方思路引向正确方向，即使良策未被接纳，也可以通过正面献策来动摇其劣策

六、建言献策的呼应法

蓝鼎元的理台策议相互联系，在论辩说服中无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之窘，此谓论说之呼应。在对台湾患得患失、充满疑虑的清政府看来，台湾的开发会助长“患自内生”的势头。因此，陈请垦台，须佐以治民之策。治民有外、内两法。外治方面，蓝鼎元提出了倡诚信立法执法、奖励官吏效忠国家、创设官庄等使官吏有养廉之资、惩治恶吏和剔除巧取豪夺恶习等整饬吏治以施惠政于民的措施。在内治方面，他提出了去恶讼、除恶棍、禁械斗、戒鸦片、崇节俭、立讲约、净风俗、设义学、淳开导等革新风习、振兴文教 measures。这样，“因其势而利导约束之”，“使归善良，则多多益善”；“民气可静”，则“久安长治”矣。¹⁴蓝鼎元还提出以开垦促县治设立，以县治设立促防务和开垦，提议在半线（彰化）另设一县；提请准许台民移眷来台；针对垦辟中出现的汉、番（高山族）矛盾，提出限期令番垦辟，不垦则听民垦耕，或银贴番纳饷、易地开垦的方法。这些环环相扣的措施提议，使垦台政策显得稳妥可行。并且，垦台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浑然一体，即使总体未被接受，若局部被采纳了，对总体也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雍正元年（1723 年）采纳并实施蓝氏提出的在诸罗县以北的半线另设一县的提议；雍正十年（1732 年）广东巡抚参照蓝氏意见，奏准清廷准予台民移眷来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开发。

七、不厌其烦的屡说法

在国家行政系统的上下纵向信息传播是不平等的关系，在封建专制下尤然。上达下犹顺流而下，下陈上则如逆水行舟。如果下级以为说服上级可以一蹴而就，结果一有挫折就灰心缄默，那么已作的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鉴于清政府以防台为基本方针，积极的理台策议难于采纳。对此，蓝鼎元总是不厌其烦作筹台说服。在垦台问题上，蓝鼎元于康熙六十年（1721 年）到六十一年（1722 年）在台期间不断说服倡导，略有成效。离台后调入京“校书内廷”，雍正六年（1728 年）任普宁知县，雍正十年（1732 年）任广州知府，仍念念不忘台湾的垦辟。尤其是在雍正元年（1723 年）撰《平台纪略》，雍正二年（1724 年）写《与吴观察论台湾事宜书》，不辞舌敝唇焦，不断陈述垦台主张。尽管垦台之说服，效果有限，但从较长时间来看，还是逐步被采纳、实施。

八、内锐外柔的劝上法

蓝鼎元筹台策议影响理台历有清一代，足见其策议的远见卓识。若部属藐视上级，对其指示置之不理，一味高谈己见，甚或出言不逊，厉语严词痛斥，将有傲上震主之嫌。通常部属只有尊重上级才可望上级重视其意见。蓝鼎元无论是代其当总兵的族兄拟稿或是以自己名义撰文，皆心纯意诚，敬重上级。平台之始，闽浙总督令蓝廷珍挥师取南路，从打狗港攻台。然而，南路港浅，舰至还须换小船方可上岸，登陆后蔗林夹道，易遭伏击。故征台大军拟改从中路直取鹿耳门。蓝鼎元代蓝廷珍拟《与制府论进兵中路书》，先说：“伏承宪檄，令某统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台湾，当即缮治舟师，刻期进发。”此语拂去傲上之嫌后，便细说直捣中路可制胜之议，最后言：“苟利国家，勿厌狂瞽，望速示下。”¹⁵这仍是在表

示对上级的尊重。《与制府论进兵中路书》对闽浙总督驳议甚多，但开头就有：“职等自当遵命，次第举行。亦有愚昧无知，胸中未能悉达，不得不略属僚奉上之文，而讲师生质疑难之谊。伏惟宪台，少加垂察。”¹⁶即使在批驳荒谬迁民划界的《复制军迁民划界书》中，也没有将上级说得一无是处，令其汗颜无地。蓝鼎元在言辞犀利的陈情、审理、度势的说辩中，留意缀以谦恭尊上之辞。说服有时还假定对方与己见同，甚至高于己见，以鼓励对方接受劝说，进而采取行动。

《论台镇不可移澎湖书》在批驳台镇移澎之廷议、激言台湾战略之重要后，恭敬地说：“某庸愚无识，以为此土万万不可委去，特恨位卑人微，处不可言之地。想宪台与中丞吕公、提军姚公，必有一番议论，为社稷苍生回天指日。或会疏入告，或密折婉商，造万事无疆之福，非某所敢饶舌也。”¹⁷

蓝鼎元的筹台文章，笔走游龙，析理透彻，深蕴说服的艺术。若无丰富的思想内容，说服艺术也徒然。其同学旷敏本称道：“其为文，如万斛之泉，随地涌出，而无不逢其源。”¹⁸

早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蓝鼎元写的《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这篇三千言长文中，就提出了武备、抚民两个基本的理台思想。他说：“练兵丁，选死士，精器械，慎机密，搜丑而歼之，治其标也。”“当知弭盗之源，在乎民风士习。课农桑、修学校，以养以教，自然不为盗贼，治其本也。”“用兵之道，安民为先，弭盗之源，抚民为本。”¹⁹

在武备这一思路中，蓝鼎元不断深化“经理海疆之要务”的战略思想。他开始所提的武备，只是搜捕“截劫商船”的“贼船”，包括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东征台湾后，蓝鼎元“经理海疆”的思想上升至台湾对于沿海诸省的重要性，以及若变相地放弃经营台湾将使台湾为外夷所染指这一高层次的认识。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蓝鼎元反复强调守台御外，雍正六年（1728年）他在《台湾水陆兵防疏》说：“台湾海外天险，日本、荷兰素所朵颐之地。东南风顺利，十余日可至关东。此齿唇密迹之区，未可以遐荒海岛目之。幸际盛平，不忘武备。”²⁰蓝鼎元正是基于台湾在战略地理的重要性和防备外国入侵的这一高层次来筹台的。如此，蓝鼎元的筹台议论如高屋建瓴，谈锋锐不可挡。

基于安民抚民的基本思想，东征后，蓝鼎元审时度势，在论迁民划界之荒谬、请广听开垦的一系列论议指出：“人无良匪，教化则驯”；²¹“治安之政，宜严不宜宽；将安将治之民，宜静而不宜动”；²²“度地居民，为此日第一急务”；²³“令各土番自行垦辟”，“不垦者听民垦耕”；²⁴“设兵本以卫民”；²⁵“若安官兵，则民不招而自聚，土不待劝而自辟”；²⁶“严禁社棍通事之酷虐，以安番黎”；²⁷“多设义学，振兴教化”，²⁸这些安民抚民教民的思想在当时是可贵的开明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蓝鼎元的安民抚民是与前述的筹台卫疆相联系的，这种联系有利于蓝鼎元说服消极治台而遏制台湾开发的谬见逐步改弦更张。当然，蓝鼎元的安民抚民最终为的是统治阶级治民，并且其“抚”是与“剿”相配合的，即使他在东征中有“多杀生灵，其实无益，谅仁人君子之所不忍闻乎”的感叹。

蓝鼎元筹台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是其长期博学多识、经世致用在政治视野拓宽后的厚积薄发。他10岁丧父，四书五经已能成诵。稍长，从族伯唐民先生读书山中，览读诸子百家、礼乐名物、韬略行军，沉思穷究。年17，观海厦门，又泛海舟历全闽岛屿，并至浙、粤，自谓此行所得者多。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入邑庠读书，拔童子试第一。后督学沈归安招其入使院，赞“国士无双”，时年24岁。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参与纂订先儒诸书于福州鳌峰书院，名儒福建巡抚张伯行谓其“确然有守，毅然有为，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后他以亲

老侍养，辞归故里，致力于宋先儒及许、薛、胡、罗之书，沈潜玩味。²⁹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其呈族兄蓝廷珍《论镇守南澳事宜书》中，反映蓝鼎元对海疆事务已有缜密构思和成竹于胸。东征后，蓝鼎元注意实地调访踏勘，所录可见其凡事求精求详和务实作风。这些考察调访增进了他对台湾社会问题、风土民情、自然地理的认识，为其政治见识提供了可靠的背景知识和现实状况。博学多识，善思务实，使得他的筹台之见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处，也因此对他人的政治开导说服具有一种见识的级差态势，凭此势而利导。

人有诚信，其言可闻。蓝鼎元自幼以俭养德，少年时“读书山中，月携白盐一罐，无他蔬”，“作白盐赋以自励”。青年时被督学沈归安誉为“人伦冰鉴”。他敦本行、严取与、慎交游。雍正六年（1728年）授普宁知县，“邑故有渔船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输金以易新照。”蓝鼎元峻却之，“镌石于泊之步”。自入仕途后，“未尝一日忘贫贱，茹蔬衣敝”。“伉直之性，不以势怵利诱而少有所回护顾惜。”“正人君子壮其节，亮其心，终爱而敬之。”他一生“虽历患难，未尝轻受一人钱”。³⁰以俭养德，廉洁诚信。东征在台时，蓝鼎元强调立法“必诚必信”，“言必践，禁必伸”，³¹“君子不可失信于民”。³²蓝鼎元树诚立信，在其说服中的确产生了令人易于置信、慕风向诚的人格力量。并且，其谨守廉洁，不为物诱，不为名役，支持着独立不倚的意志和求真务实的态度。诚如其《平台纪略》自序所言：“据事直书，功无遗漏，罪无掩饰，自谓可见天日、质鬼神”。在他屡屡上书驳议中，充盈着刚直无畏的正气。

蓝鼎元文如其人。其文遒劲清新，简朴明快，生机饱满，自然天成，绝无舞文弄墨积习。承其师训：“人有文章，犹天地之有山水”，他“纵笔所如，不复修饰”。³³时人评曰：“古人原来未尝有意为文，说理谈事如家常告语，其胸中有恻隐善恶，真性情流露笔墨间，则为至文。今人雕肝琢肾，句造字锤，有藻绘而无义理，有浮华而无神气”。蓝文则“词不尚浮夸，而论切中乎人情物理”。³⁴蓝鼎元筹台之论真实自然，达理通情，读之如临清风，兴味盎然。这种文风对其说服之效甚有助益。

注释：

¹ 本文所引的蓝鼎元为蓝廷珍代拟之文，皆出自蓝鼎元《鹿洲全集》，即蓝鼎元自己确认为己文。《鹿洲全集》在蓝鼎元逝世的前一年即雍正十年（1732年）出版。

² 蓝鼎元：《东征集》卷一《檄台湾民人》，见蓝鼎元撰，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下蓝鼎元文集除另注明出处，皆见此全集。

³ 蓝鼎元：《东征集》卷一《檄台湾民人》。

⁴ 《东征集》卷一《檄台湾民人》。

⁵ 《东征集》卷四，《论台镇不可移澎湖》。

⁶ 《东征集》卷四，《论台镇不可移澎湖》。

⁷ 《东征集》卷四，《论台镇不可移澎湖》。

⁸ 《东征集》卷三，《与制军再论筑城书》。

⁹ 蓝鼎元：《平台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14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7年，第28页。

¹⁰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¹¹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迁民划界书》。

¹²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¹³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¹⁴ 蓝鼎元：《平台纪略》，第31页。。

¹⁵ 《东征集》卷一，《与制府论进兵中路书》。

¹⁶ 《东征集》卷一，《与制府论进兵中路书》。

¹⁷ 《东征集》卷四，《论台镇不可移澎湖》。

- ¹⁸ 旷敏本：《鹿洲初集》序。
- 19 《东征集》卷四，《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
- 20 蓝鼎元：《台湾水陆兵防疏》，见《平台纪略》附录，台湾文献丛刊本。
- 21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 22 《东征集》卷三，《檄诸将弁大搜罗汉门诸山》。
- 23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迁民划界书》。
- 24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二，《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
- 25 《东征集》卷三，《复制军筑城书》。
- 26 《鹿洲初集》卷三，《谢郝制府兼论台湾番变书》。
- 27 《鹿洲初集》卷二，《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
- 28 蓝鼎元：《经理台湾疏》，见《平台纪略》附录，台湾文献丛刊本。
- 29 朱轼：《鹿洲初集·行述》。
- 30 朱轼：《鹿洲初集·行述》。
- 31 《鹿洲初集》卷二，《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
- 32 《东征集》卷四，《论征台壮丁停饷归农书》。
- 33 蓝鼎元：《鹿洲初集》序。
- 34 王者辅：《东征集》序。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